

從中國的社會觀察者到福傳同行者

韓德力

聖神研究中心存在已有二十五年，這是我們慶祝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中國傳教進展的好時機。中心在一九八零年十月開辦的時候，我們尚只是中國的觀察者，還未能訪問中國，僅是試圖從外面了解情況。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我們已成爲福傳的同行者，參與具體的合作計劃並幫助建設中國的本地教會。

一九七零年代中國與世界舞台的歷史變化

一九八零年是中國觀察者年代的末期，一九五零年代被逐出中國的外籍傳教士，只能遙遠地「觀

察」中國、閱讀報紙、聽廣播，然後猜測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九七零年代，觀察中國變成一種普遍的風氣，每一個人都可以感覺到即將發生變化。那是中國急劇變化的年代，文化大革命才剛告一段落，中國大陸老一代領導人逐一凋零。劉少奇和林彪分別在一九六九和一九七一年離開政治舞台，周恩來於一九七六年一月病逝，而毛澤東也於同年的九月過世。一九七五年於台灣海峽另一岸的蔣介石逝世，劃下台灣歷史新時代的開端，到今天都還有重大的影響。鄧小平經歷幾番起伏，終於成

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人們批評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把文化大革命搞得太過火，但卻沒有指責毛澤東本人。然而，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中國即將開放一個嶄新的、有計劃的未來，過去的毛澤東主義即將被一套新的價值觀所取代。在中國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後，未來幾十年的歷史發展草圖已經浮現。

與中國國內變化相類似的，其他國家也有了這些重大演變。當一九七一年教宗保祿六世由卡薩洛理樞機 (Cassaroli) 陪同訪問香港時，聖父本來打算安排特意向中國演講，不過顯然鄰近的政府當時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聖座結果刪去講稿中這一重要的部分。一九七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前往中國訪問，可惜後來發生的水門事件迫使他提早卸任。

中國研究的突破

一九五零年代傳教士被逐出中國之後，想要得到中國的消息變得重重困難。自一九四七年起，美

國紐約的天主教全國委員會出版了 *China Bulletin/ China Notes*¹。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國傳教士 (China Missionary)》也於一九四九年在香港現身為 *China Missionary Bulletin*，一九五三年標題改名為 *Mission Bulletin*。一九五三年耶穌會的勞達一神父開始出版著名的《中國時事分析》，它不只是針對教會消息，而且廣泛地提供中國共黨內部的許多話題。一九五七年道風山在香港開始出版《景風》，與其他刊物同樣，不時地提供大陸宗教的消息。其他出版物計有：一九四九年起巴黎外方傳教會出版《法亞交流》於巴黎，一九六一年開始出版《共黨控制地區的宗教》於紐約，一九六八年開始比利時的 *Pro Mundi Vita* 出版關於中國的小冊子，一九七一年「信義宗世界聯盟 (LWF)」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研究小組」開始出版

¹ 資料是從 "The Christian China-Watchers", by Parig Digan, Brussels, Pro Mundi Vita, 1978

Information Letter.

當時全球的一股中國熱，藉由一九七零年代的許多新興出版物可以得到驗證：《中國談話》（衛理會）、《我們和中國》（加拿大教務委員會）、《中國研究計劃公告》（英國劍橋大學研究小組）《共產國土的宗教》（Keston College），以及趙天恩在香港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所出版的不少刊物。其他的月刊或週刊亦提供不少的訊息，例如《信仰國際通訊社》（羅馬）、中英文版的《公教報》（香港），“Herder Korrespondenz”(Freiburg)《天主教國際訊息》（巴黎），和《國際傳教回顧》（日内瓦）等。

中國觀察者對大陸資訊各說各話

我們注意到這些出版物，代表了對於中國大陸情況廣泛的理解和詮釋，從極右的到極左派的都有，這是一件很有趣也很重要的事。在勞達一神父的《中國時事分析》當中，我們可以發現關於中國真實與客觀的消息，我們也可以閱讀勞達一神父對

於中國意圖消滅基督宗教的個人觀察。另一方面，當年擔任加拿大天主教委員會中國大陸計劃的主任 Ray Whitehead，則從不一樣的角度去觀察中國大陸，在他一九七七年的論文「基督，救贖和毛澤東主義」中指出，在中國我們可以找到救贖、信德、希望、愛、奮鬥、犧牲和靈修。他在文章中質疑，從有神論對無神論²的觀點，基督徒是否比毛澤東主義信徒佔優勢。

天主教傳教修會所設立的中國研究圈

早在一九六零年代，對中國的新興趣開始在基督教的圈子蔓延，從一九六六到一九七零年，國際會議相繼在日内瓦、香港、滿地可和 Harvard's Heath (英格蘭) 舉辦。美國的全國天主教委員會和聯合長老教會贊助會議的經費，他們對中國大陸採取相當樂觀的看法。在七十年代初期，天主教徒和

² 同上

基督教徒都嘗試與 Sedos 合作建立一個教會的中國研究單位，只可惜這計劃一直沒有實現，取而代之的是在天主教會內的許多大陸研究機構紛紛設立，他們大都隸屬傳教修會，例如：巴黎外方傳教會的 Leon Triviere 和沙百里，宗座外方傳教會的

梁作祿，德國方濟各會的衛里基，教區輔助司鐸 Van Campenhout，聖母聖心會萬廣理和薛寶義，高隆龐會的 Parig Digan。許多負責天主教和基督教研究中心的人進一步取得聯繫，當時香港舉辦了一場崇基書院研習營（一九七五年），趙天恩牧師雄心勃勃地策劃「中國教會與文化研究中心」（一九七七），在第一屆利瑪竇研究小組的會議當中，天主教徒也交換他們對中國的看法。這就是在一九八零年十月一日聖神研究中心開始時的一些背景。

「中國研究計劃」於一九七一年在倫敦設立，它不僅與蘇格蘭和愛爾蘭保持關係，也同時與布魯塞爾的 *Pro Mundi Vita* 和其他歐洲的中心有聯繫。在歐洲大陸，路德世界聯盟的中國研究計劃與 *Pro*

Mundi Vita 合作，對於關心中國大陸的基督徒以及希望對中國福傳交換新看法的人來說，這項連結成爲他們之間的溝通管道。

Bastad 和魯汶的會議（一九七四）

從 LWF-PMV 的聯繫交流，一九七四年發展成兩個重要的中國會議，從會議籌備者之一的耶穌會士 Jan Kerkhofs 的一番話中，我們可以了解當時在海外觀察中國的精神，他說：

在這個學術會議之中，我們所尋求的是去『閱讀』天主透過中國人民完成的事工。我們承認，我們的基督徒信仰很明顯地因著中國經驗受到很大的挑戰，不僅在於它的獻身精神，也在於它的內容。³

³ 見“Christianity and the New China”的書籍，由 LWF-PMV, South Pasadena, California: Ecclesia Publications.

魯汶中國會議也不例外，不只由於論文的內容，而是因為它是唯一結合六大洲來的代表，並且來自基督宗教世界的三個主要宗派。這些會議中充滿不同的意見，勞達一、Whitehead、秦家懿、薛寶義、趙文詞、Rhea、Gustavo Gutierrez、衛青心、陳志讓和其他人，都致力於如何了解中國大陸的問題。正如 Parig Digan 所說，每位演講者所代表的只是他個人的意見，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國如火如荼地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當時中國人批評林彪和孔子（批林批孔），因此那時魯汶會議不應該被視為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基督教的新願景。參與者從許多不一樣的觀點去體驗認識中國，他們最多只覺得自己是在這長久探索中的最初階段。在二十五年的過程之後我們發現，聖神研究中心的《鼎》仍然反映了各種各樣的看法，截至目前已有相當重要的發展，不過依然呈現兩種不一樣的觀點。

在一九七零年代的後期，Arne Sovik 分別在 Arnoldshain（一九七六）、倫敦（一九七七）、布魯日（一九七九）舉辦信義宗世界聯盟會議，同時 Jan Kerkhofs 也開始了「歐洲天主教關懷中國會議」（CECC），分別在慕尼黑（一九七五）、巴黎（一九七五）、布魯日（一九七六）、巴黎（一九七七）和羅馬（一九七八）召開。在一九七零年代的後半期，每個人都感受到中國的變化即將發生。

八十和九十年代：中國福傳的同行者

當鄧小平執政時，中國開放與外在世界合作，開始與國外的大學和機構設置文化與科學的交流計劃，許多中國學生前往美國和歐洲求學。在中國，人們重新提出宗教信仰自由，外國觀光客比較容易拿到中國簽證。對中國公民的生活來說，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嶄新的開放也可以在宗教領域發放，教友獲准參加彌撒，一些天修院甚至重新啓用。

⁴ Cf. Parig Digan, 同上, p24.

一些剛剛獲釋的神父和主教，拒絕加入天主教愛國會，因為它不受聖座管轄。在此景況下，香港教區胡振中樞機預見時代徵兆，設立聖神研究中心，並得到許多傳教修會支持，包括宗座外方傳教會、巴黎外方傳教會、聖母聖心會和瑪利諾會。《鼎》期刊亦成為關心中國教會者分享訊息的管道。

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發展，新加坡開始「中華公教聯絡社」，在魯汶大學成立「南懷仁文化協會」，羅馬成立「天下一家」，德國聖言會在 Sankt Augustin 成立「中國中心」，美國成立「中國天主教美中服務處」，每個中心都出版自己的期刊，包括《中聯通訊》、《懷仁之驛》、《中國教訊 (China Heute)》。在一九八零和一九九零年代當中，LWF-PMT 的合作發展成每三年一次的「歐洲中國合一會議」和「天主教中國歐洲會議」。美國的「中國天主教美中服務處」在過去的二十一年中，每年都舉辦天主教中國會議，這些中外人士定期地在聖神研究中心舉辦非正式聚會，這類活動成了與中國交談的管

道，他們試圖為中國教會和普世教會搭起橋樑，他們也幫忙中國教會和中國社會培養良好關係。八十年代當中，越來越多的中國夥伴們參與這些會議，並在許多的期刊上發表文章，外國傳教士與中國關係的新型態逐漸形成，他們其實並沒有真正地在中國生活與工作過；但透過參與建設中國教會的傳教活動與合作交流，他們已成為中國福傳的同行者。

今日中國教會的歷史性傳教挑戰

四分之一世紀以前，我們只能從外面「觀察」中國，在交談了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我們會合了中國教會的兄弟姊妹，因為他們反映時代所面臨的傳教挑戰，這些看起來好像都是歷史方面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應付得宜，也可以提供給中國教會一個難得的機會去超越歷史中的許多誤解。

中國的教會如何面對大多數是無神論的中國人？有一些人是被說服而成為無神論者，有些是受到過去幾個世紀歷史事件的影響而對基督宗教產生

偏見，或是因為受到過去五十年來政治宣傳的影響。起初有十七至十八世紀的禮儀之爭，然後是不平等條約，十九世紀義和團之亂，最後是二十世紀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結果是中國的基督宗教被孤立了，它的支持者僅佔全國總人口數的一小部分，而且他們經常被看不起。如果中國教會能夠與社會修好，並且被接受為中國的宗教，而不是國外的宗教，被給予適當的位置成為社會的一部分，這樣不是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嗎？這也許是今日中國教會所面臨的基本挑戰。

我們觀察到，過去五十年來普世教會試圖與社會交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與中國對談的先驅者，二零零一年他為過去的錯誤道歉，儘管當時中國不把這樣的道歉放在眼裡，不過，在教宗過世的兩天後中共表達了對當初這席話的感激，他們放棄了以前試圖破壞宗教的政策，不再視宗教為「人民的鴉片」。事實上，當局有賴宗教去對抗社會中的道德衰敗。對話可能產生嗎？很明顯地，答案是——

「會」。然而，到目前為止多次努力都未有成果，部分的教會成員贊成與政府合作（即「官方團體」），不過另一部分（即「地下」）卻拒絕，這是因為政府仍然強迫教友去建立一個獨立於羅馬之外的教會，一些主教和神父因為這樣的緣故被拘捕。江澤民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提到，政府的態度與它的官方政策相矛盾，也就是說對待宗教需尊重他們的信仰。

中國社會似乎非常支持與基督宗教交談，今天在中國有超過三十五所以上的大學研究基督宗教，儘管他們侷限於學術研究的範圍，我們還是可以把這些中心視為對談的對象。聖神研究中心的二十五週年提醒了我們，應該與這些中心一起做些有創意的傳教計劃，與他們合作交流，討論諸如道德和社會關懷等一般議題，基督宗教在這些領域內有一正面的訊息，可以幫助社會處理今天所面對的諸多複雜問題。在建立地方教會的任務上，傳教士也許不會被正式受邀扮演直接的角色，不過他們可以被允許直接參與這樣的交流計劃。

再造內部的團結並更新教會團體

今天數以千計的中國公民受到福音訊息的感動，有興趣進入教會。教理班在各個教區紛紛開辦，令人振奮；但是在這裡我們碰到一些主要的困難：

教會的內部分裂。教友們慶祝在同一聖父內相愛的團結，不過卻分在兩個不同的團體內慶祝——官方與非官方，他們之間互不來往，因此教會面臨信任危機。再者，一九八八年所頒佈的教會文獻「八點指示」，也阻礙了這兩個團體一起慶祝感恩祭，何時教會的代表人物才會移除這種曖昧不明的情況，公開地鼓勵中國的基督徒一起參與彌撒？過去聖神研究中心的《鼎》期刊為雙方的和好扮演了角色，未來它仍會持續這樣的任務。

中梵關係正常化的突破已近了嗎？

上海邢文之輔理主教的晉牧，被一些媒體描述成是某種朝向中梵關係正常化的突破，據說中國政

府和梵蒂岡雙方都同意任命一位主教，不過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權威人士說他們並不清楚梵蒂岡對邢文之主教的委派，天主教愛國會一位負責人屢次在北京的電台上發聲，說中國與梵蒂岡沒有外交關係，暗示這層關係不存在，中國是不可能同意梵蒂岡的。人們因此感到困惑，大概雙方沒有協議，不過中國和梵蒂岡雙方卻都分別承認邢文之主教。

自從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過世後，中國和梵蒂岡都為雙方關係正常化示意，此舉本身以及雙方在宣布時的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只不過意味著雙方都準備好協商，而並非已有協議存在。

關於中梵關係的問題，自從一九八零年代以來我們可以看到緩慢但穩定性地成長。在八十年代，當一些官方主教開始向聖座申請，希望他們受到政府的任命能得到羅馬的認可時，他們通常秘密地進行，以免遭到政府的反彈。政府表面上並不同意這樣的申請，但當他們獲知這些主教暗中與羅馬聯絡時，他們並沒有作出太多的反應。這麼多年來，許

多官方主教受到教宗的認可以及委派的「秘密」，已成為教會內外衆所周知的實情。這是很重要的正面發展，而且似乎也進行的很順利。

自從一九九零年代起，一些年輕的中國神父獲任命為主教。包括政府在內，大家都很清楚，中國的教友希望他們的主教能夠得到教宗認可。經由政府挑選而成為「官方主教」的人選，甚至是那些在二零零零年主顯節被迫晉牧的人，也都想辦法申請羅馬的認可，其中有些成功，有些則否，政府也知道這樣的狀況，不過還是讓事情發生。於是有幾位年輕主教既接受政府的任命而公開晉牧，同時也得到聖父的認可，我認為這是朝向中梵關係解決之道的和平化演進。上海的任命與晉牧就是另一種不用言語交涉的自然成果。

二十多年來，我們注意到已有相當的進展，北京和羅馬雙方甚至都願意超越「主顯節事件」和「聖事件」的僵局。最近一些樞機到中國訪問，對於開啓談判的大門、重新引進一正確、友愛的氣氛，

毫無疑問具有相當的幫助。

未來的挑戰：中國教會的內在團結

中梵外交關係正常化是只能由外交人員主導的一個複雜且微妙的過程，不會因媒體的矚目而達成，唯有成熟的協議才會令中國和梵蒂岡同時受惠，這樣的協議必須包括中國天主教會宗教生活的正常化，這意味著教友獲准表達與教宗的合一，教友也必須在他們之間重新建立團結。當有一天這層突破發生時，中國的老主教將是最高興的人，在他們為此而祈禱、希望和奮鬥。在此刻開啟的新階段，我們可以預見年輕一代的中國主教將領導中國教會的未來，他們面臨許多的挑戰，教友對他們的期望也很高。首先，他們希望牧羊者是真正關心羊群的和好與團結。第二，牧羊者必須開放與社會和政府對話。的確，看起來聖神研究中心的二十五週年慶將會成為中國教會歷史的另一個新開端，它帶來新的挑戰，也很有可能產生新的成績。

